

绪 论

对于“文化”这一概念，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我们说熟悉它，是因为社会上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道德修养、处世方法等等，无不受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制约，表现为一定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人”。我们说对“文化”这一概念又是陌生的，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文化”一词进行界定的话，就会感到，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

在希腊语中，“文化”一词的含义是与“自然”相对的“习俗”。在拉丁语和英语中，“文化”一词又具有“耕种土地”的实在意义，但又非指农耕生活，而是近似于“园艺”。18世纪，伏尔泰等人在法语中使用“文化”一词，则指训练或修养心智、思想的状态和结果，包括风俗和精神。1926年，有两位西方人类科学家为弄清“文化”一词，遍稽群书，寻章摘句，竟发现有161种定义，仅搜集和分析这些定义就能写成一本书。在这些定义中，有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认为文化是人类经由一代又一代的相传、积累而成的总和；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文化是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中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人从结构学角度出发，认为文化是由彼此关联、彼此依赖的习惯性反映方式所组成的系统；有人则从发生学去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交往的结果或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果。在表述方法上，有的是准则性的，认为文化是为一种生活或行为的方式提供模型、风格或准则；有的则是描述式的，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

仰、艺术、法律、道德及风俗在内的复杂整体……。19 世纪中后期，泰勒和摩尔根创立了人类文化学，主张文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史前文化经由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感，立刻把握住这个学说。尽管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化学的专著，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化定义，但他们却以人类文化学为契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化思想的宝贵材料。在《路易斯·亨·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文化思想，为我们研究文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现象与人类活动密切联系起来，既承认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不存在超然于物外的所谓“纯文化”，又认为文化一旦形成，又影响物质生活的进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马克思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出发，对文化给予唯物主义的解释：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从物质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必须从物质实践来解释文化现象。而历来的观念所影响的历史编纂法，“特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史和政治史”的编纂法则与此相反。“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② 而是有了自己的生产规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只是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困难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82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11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①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已经窥视到文化殿堂中的美妙和文化的无穷魅力了。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文化的具体形式，并从中探讨了文化的社会本质。文化的形式纷繁多样，但可以归纳为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观念形态）的文化以及中介形式的文化，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等。“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这种基础 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不因此有所削弱。”^②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不仅仅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还应包括物质成果及其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交往方式等。这就使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豁然开阔，给我们今天对文化社会本质的研究，起一个指点迷津的导航作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本质，从而也揭示了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通过劳动创造世界。人创造了能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世界。所以，人的本质表现在他的创造活动中，也即表现在他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中。反之，任何一种文化都凝聚了主体人的能力、智慧、情感、观念等因素。因此，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而也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 人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人。马克思有句名言：“人创造环

境 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 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

我们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内涵的认真阐述。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对文化定义 文化 即人的创造 同时 也是环境对人的铸造 它是与“纯自然”完全相对的人创造的一切。换句话说 文化是人类生存系统之中人与自然的作用及社会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这样去认识文化，才能准确把握文化在于人的创造的本质。

中国古代所谓“文化”最早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文化”不是以词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词组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所见到最早的是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中的一句话：“凡武不兴 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 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即文治教化 与孔子倡导的“修文德”类似。《文选》中收有西晋束皙的《补亡诗·由仪》诗云：“文化内辑 武功外悠。”文治教化于内 武功安邦于外。文治武功 正是我国传统思想中治国的文武之道。前蜀杜光庭《贺鹤鸣化古树再生表》中说：“修文化而服遐荒 耀武威而平九月。”他由枯树再生而联想到文治教化可以征服蛮荒。可见“文化”一词的含义与现代人们研究的文化是大相径庭的。^② 然而，我们古人所谓的文治教化主要指对人的思想的熏陶教育，重在对人的铸造，暗合了马克思主义“人创造环境 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文化命题范畴。

所以 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文化”（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对文化内涵的最原始的思考。

总之 人们对“文化”的界说和定义是纷纭复杂的 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某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用文化的眼光观察社会历史的最低知识量 那么 他就拥有了对“文化”一词定义的能力 有多少人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4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以上见《中文大辞典》第 15 册 120 页“文化”条，中国文化研究所，1982 年版。

说它“文化”一词就有多少个定义。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文化的含义是不可知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内涵的阐述，是我们认识文化、界定文化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唯其如此研究文化，才能遵循正确的方向。而文化定义的多样化，恰恰说明文化内涵的丰富，有待我们去挖掘，去探讨。

二

如果说人的本质在于创造的话，那么文化创造就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对象化，通过文化创造，人的本质就表现在人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我们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认识，首先聚焦点是人，是人的创造。当然这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立足点。下面我们打算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来认识中国古代文化。

西方文化重视人与物的关系，而中国古代文化则更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两者不同之一。

最早持这种看法的是梁启超他在《戴东原哲学》中说西方自古希腊起就表现出了对自然界的特别兴趣。他们由于“生活在风景极佳的海边，养成了爱美爱好奇的性质，一切学术思想都从‘惊奇’之一念孕育出来”。他认为西方人由于“惊讶”进而“怀疑”，既而研究“寻求宇宙万物从哪里来宇宙有它的本体没有主宰宇宙的神有没有，因此，希腊学派虽然繁多，但他们都以推究万物变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说，西方文化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很显然，梁启超将西方文化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归结为“风景极佳的海边”等地理环境因素，^①这是文化研究中“环境决定论”的唯心主义错误然而，西方文化重视人与物的关系确系事实。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古希腊位于土地贫瘠、多山地的巴尔干半岛南临地中海相对的它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戴东原哲学》。

的航海事业比较发达。在航海中，人们与狂风暴雨作斗争，就需要天文知识；大海茫茫，要掌握航向，就需要地图学知识；计算航程，确定方向，就需要几何学等数学知识。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们创造了环境，同时也创造了智慧，这才是他们重视人与物关系的真正原因。因此，公元前 636 年—前 545 年，古希腊就已经有了地图学、天文学，泰勒士创立几何学的种种定理，毕哥达拉斯初创天文学。亚里士多德已知地球为球体，并创动力学、动物学。自亚历山大里亚起，200 余年间就有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光学。亚里士多德的“地球绕日说”，渥奇迈特的数学、物理学，埃拉士德拉的“专格致人的脑质”，里罗菲士的解剖学等等。当然，这些只是这些科学的起步，尔后由于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与其他民族接触，传播科学原理，同时增长自己的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就确定了。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这样，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就成为西方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了。

相比较，中国古代文化则更多地重视对人的研究。虽然，在上古时代，我国就有河图洛书的出现，阴阳说将世界万物分为阴、阳，五行说将世界物质概括为金、木、水、火、土五种成分。先秦两汉已出现天文学、历法、医学，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张仲景的医学理论。两宋时代自然科学已处世界前列。但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仍重视对人的研究。

先秦时代，各种思想和观点纷然杂陈，造成了磅礴郁积的文化繁荣景象，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无论是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还是道家的“无为”无不是对“人”的研究。先秦诸子辩论得最热闹的问题无非是人性之善恶，仁义之内外，理欲之关系，很显然，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这就形成了人文学科比较发达，而自然科学则显得理论性不强，缺乏系统性。

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古代文化崇远古、重经验，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重理论、重创造的思维特点。这是两者不同之二。

中国古人差不多一切思想认识都是实际经验的总结。许多学问都由亲身躬行、内省、体验而得，不像西方那样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而得。所以，中国的学问，多带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只表明“是什么”，不大追求“为什么”。我们的古人特别强调思想认识的实用性。儒家专注在力行、实践，自不在话下，道家的老子、庄子也讲了许多高妙的话，像是超现实的，而实质上仍然是现实的实用。庄子的《逍遥游》大谈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然而庄子仍然认为它是“有待”的，不算是获得“真正的自由”。庄子所追求的“绝对自由”，似是玄妙的超越现实的思想认识。实际上，庄子是在宣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着重点依然在现实。王阳明曾说，知而不行，是谓不知。这实际上是孔子“重行”思想的继续。

重实际 故重经验 重经验 故重先例 重先例 故重远古。孔子曾称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孔子托诸尧舜，墨子托诸大禹，老子托诸黄帝，许行托诸神农。但尧、舜、大禹、黄帝、神农等，从今天的观点看，不过是原始部落群的酋长，他们的思想认识比起诸子来，浅薄得多。然而，在诸子眼里，他们却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圣人。这种崇古的思维方式就形成了学术方法上的训诂解经，在实际生活中的以古绳今。

而西方文化中谈人生哲学，谈做人之道的不多，所谈主要是天地万物原理之学。在对待古人和古文化方面，也不像中国古人那样崇拜和依赖。他们并不以标榜古人为重，而是务发前人所未发，对于前人不勉强服从。对待师训，他们遵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然而他的学说往往与他的老师相悖。

当然，中国古代文化中重因袭、崇远古，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哪来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更何况中国历史上不乏具有创新精神甚至是反古的人物。从荀况的“法后王”到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从张衡的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的计算，到郭守敬的

“授时历”从四大发明到石油的发现，从《黄帝内经》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支生气蓬勃的创新力量，他们的科学发现，改变了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类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崇古也并非一味崇古，而更多的是在崇古形式下内容上的创新。正如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一样，形式上是恢复先秦时代的文风，而内容上不仅是文学上的创新，而且也是一场思想上的革新运动。更为可贵的是，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他们才是中国古代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人！

然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崇古而贱今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 统治阶级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创造力，因此，中国古代文化仍然表现出崇远古、重经验的特点。

在伦理观念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是宗法伦理，而西方古代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出社会伦理。这是两者不同之三。

虽然中国古代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是，无庸讳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儒家文化的确占据重要地位，发生重大影响。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时候，宗法伦理思想就已经定型化了。孔子学说的基本核心是“仁”而“仁”是以宗法伦理作为基础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②。这种“孝弟”是以宗法血缘关系所派生的伦理规范。孔子认为，这种宗法伦理可以扩展到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范畴，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轨迹辐射延伸。大的方面可以作为治国的基础，为立国之本；小的方面可以齐家、修身、养性，甚至渗透到社会每个人的灵魂。它仿佛是一张无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四书读本》，3页，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的恢恢天网，无所不在于天地之间。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官吏的选用、科举制度的实行，以及法律、仪礼，甚至艺术、宗教，哪怕是外来的宗教（如佛教）无不渗透着宗法伦理观念。孔孟设想，在古代先贤那里也无不如此。“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① 孟子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② 孟子将伦理简化为五种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③ 在这五种关系中，孝弟是其根本。汉武帝以后，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支配中国封建社会达 2000 年之久。为了更加系统化，《白虎通·三纲六纪篇》更为明确地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④ 《性情篇》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行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⑤ 从此，“三纲五常”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贯穿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

这种宗法伦理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巩固和加强了这种观念形式，几千年的中国小农经济又为这种观念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特别是一批“圣哲”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使这一伦理形式更加巩固和完善，再通过长期封建社会的教育，使之深入人心，教而化之，润而泽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以至于人们

① 《孟子译注》，276 页，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② 《孟子译注》，183 页，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③ 《孟子译注》，125 页，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④ 《白虎通疏证》，373—374 页，中华书局，1994 年版。

⑤ 《白虎通疏证》，381—382 页，中华书局，1994 年版。

的精神世界。

相比之下，西方的宗族观念的确比较淡薄。原因是西方商品经济发展早，城市发展快，家庭形式及其家族观念，变得脆弱而淡漠。西方的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社会伦理上，尤其是西方古文化，讲究贵族、平民、奴隶等级制度。希腊之斯巴达、雅典，皆贵族统治。古罗马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都是贵族政治。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西方社会伦理观念渐趋淡薄，代之以法律的形式统治国家。梁启超曾说，西方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封建制度，二是希腊哲学，三是耶稣教。三者结合形成了西方文化的特色，贸易和战争促进了西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重视对“人”的研究，重视经验，崇尚远古，亦即重视人的主体对自然客体的创造，形成了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洋洋大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又笼罩着儒家思想的炼炼外衣。它像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矗立在世界的东方，扑朔迷离，杂彩纷呈。自古至今，有多少学人穷尽毕生精力孜孜以求之，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身在“此山”，为此倾倒者有之，为此徘徊久而不知其貌者有之，至近代，因为主张“全盘西化”，切齿诅咒者有之，主张盲目排外，乐而忘返者有之。也有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有识之士，主张“拿来主义”，精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至于西方学者，亦因为身不在“此山”，景行行止，高山仰止者有之，视为洪水猛兽，大呼防祸者有之。也有像英国李约瑟博士那样的学者，涉海探宝，得其骊珠，深得中国古代文化的真谛。

三

我们开设《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门课，就是要我们的中学语

文教师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以便教育下一代热爱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力量，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加民族凝聚力，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是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繁荣发达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要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研究和学习我们民族文化的现状和历史，不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任何理论、计划和设想都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门课程。

我们明确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目的和意义之外，还必须弄清两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和古代汉语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和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

1.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和古代汉语

自古以来，古代文化就是古代语言学家非常重视的一个课题。在经传注疏中，许多训诂学家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语言训诂资料，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资料。从汉代的毛亨、孔安国、郑玄、马融、高诱、王逸，到隋唐时代的孔颖达、徐彦、杨士勋、贾公彦，宋代的朱熹、邢昺，以及清代的段玉裁、戴震等，由经书的传注到传注的笺释，形成了一整套的训诂之学，也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

在古籍的注疏中，词语的释义与文化知识的蒐集是同步进行的，古人将二者看做是诠释词义密不可分的两部分。

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反映。汉字形和意的关系，实际上是汉字的形体对一定阶段的文化生活的再现。汉字的符号意义，既具有词汇学的意义，又具有文

化学的意义。所以在分析汉字的结构时就能够揭示词义 探求原始文化。在这方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许慎的儿子许冲在许慎去世后向皇帝献上这部巨著时，作《上表》说：“《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 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kūn 即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 莫不毕载。”由此看出，《说文解字》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字典 而且也是中国第一部古代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我们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鉴，《说文解字》：“鉴 大盆也。一曰鉴诸 可以取明水于月。”^② 鉴 原作“监”是人在盛水的盆子上照面之形。许慎从字形上训释了“鉴”的本义，同时也告诉我们古人照面的方法。青铜器出现之后 改用铜镜照面 故“监”写作“鉴”加一“金”字 表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吊，《说文解字》：“吊 问终也 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从薪，故人持弓驱禽也。”吊 本写作“𣦵”，是人背弓的形象。这从字形上分析了“吊”字的原始意义。这个原始意义中又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 古人的葬仪制度。段玉裁则进一步解释说 古人朴质 人死后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见其父母尸体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 所以，《竹书纪年》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歌谣以记其事。孝子持弹弓驱除禽兽 他们的朋友持弓前来相助 所以，“吊”即有“问终”义。^③ 因此 有“吊丧”“吊唁”诸词的出现。这里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我们首先了解到古人最早的丧仪，颇类似今天还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流行的“天葬”和“悬棺葬”。其次是守丧制度 孝子的守丧，友人的吊丧，即使是后来改为棺椁盛尸，葬于坟墓的“土

《说文解字注·𧈧部》，67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说文解字注·金部》，70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同上 383 页。

葬”之后,仍然盛行守丧和吊唁制度,甚至流传至今。我们从“吊”字的训释中,找到了封建社会丧葬制度的源头。

因此,文字训诂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史学。在古代语言学看来,讲清古代有关的文化知识,是诠释汉字的必要途径。

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丰富文化知识的著作,还是经书一类的典籍,以及为典籍所作的传。《诗经》本来就是自西周初到春秋时期中原各地区民歌的汇集,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大量的民风民俗、道德风尚、仪礼制度等多方面的文化状况。《尚书》及注疏记载了殷商和周初的政治、经济、文化。《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看来,《尚书》是商及周初历史散文和文告的汇编。在周公旦于洛阳发布的几篇文告中,提出了“敬德”和“无逸”的主张,对后代儒家文化有很大影响。《周礼》及《仪礼》、《礼记》被称之为三《礼》,是仪礼文化的专著。《春秋》及《春秋》三传,既是历史著作,又可以看做是文化史的著作。春秋时期的文物、制度、仪礼、风俗,无一不涉及。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引用了《左传》昭公十年的一段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鲁迅先生指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文明”。^①《左传》这段话,为鲁迅先生用批判的眼光揭露传统文化中“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翔实文化资料。还有《周易》,这是一部古代哲学著作。比如《周易》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开一辟谓之变”。就讲出了古代的阴阳说,这种学说渗透到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体系中。同时,不少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历算、医学,都以阴阳说为基础,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之一。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与古代汉语知识,同是产生于古代文

明土壤上的两朵奇葩，本是密不可分的。自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将有关文化知识独立成章专有论述后，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才独立出来 编入高校教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 研究“中国特色”成了热门话题，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蓬勃开展起来，中国古代文化也作为一门课程在高校文科专业开设。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门课 既是《古代汉语》的辅助课程 又是一门独立的专业性很明显的学科。

2.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与中学语文教学

作为师范性质的大专院校，教育的对象是中学语文老师，所以，我们所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课，与一般大专院校的古文化史的研究和教学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联系，我们的文化常识课，应当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它提出的观点，是文化研究者公认的，它是吸取了各家的意见综合而成的。所谓区别，那就是我们以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问题为取材的出发点，然后作系统化、理论化的阐述。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古代文化的大海中，选取为中学语文教学所必需的内容，只取一瓢饮。这也是我们编写这部教材的指导思想。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今天的中学老师也同样担负着“传道”、“受业”、“解惑”的任务。我们的“传道”就是要传马克思主义之“道”传爱国主义之“道”传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道”。所谓“受业”就是传授学业。中学语文教材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占有很大分量，老师只有具备一定的古代文化的知识量 才能从容地进行教学 才能正确地“受业”。

我们重点谈“解惑”。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 可以用来解惑的手段有多种，但是，很多中学语文老师的教学经验证明，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解决学生语文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

首先，从全局上把握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开拓思路。中学语

文教材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它的作者的思想，无不是一定时代的文化所铸造的历史文化品格的反映。唯其提高文化意识，才能开拓学生的思路。比如，要讲授鲁迅的作品，就必须认识鲁迅及其作品产生的时代，也就是要首先从全局上把握鲁迅生活的时代的文化环境。这样，《狂人日记》中狂人“从来如此 便对吗”的怀疑，《祝福》中祥林嫂面对悲惨命运的质问，《阿 Q 正传》中阿 Q 式的革命……都会得到正确的理解。以崇尚远古满足现状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的情性，到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已经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当时中国的改革运动，不能不以历史的批判、否定为先导，而鲁迅正是站在这一时代潮头上大声疾呼、奋然前行的一位代表人物。“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旧世界整体性的全面怀疑和否定。鲁迅及同时代人就是在从总体上否定过去现在的社会制度、文化体系的同时，希望获得创造的相对自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去认识鲁迅的作品，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精神实质。

其次，中学语文教学要点破文化难点，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语文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有些是仅凭词汇知识、语法、逻辑知识很难解惑的，语文水平的提高，是综合能力培养的结果。某种情况下，只有点破文化难点，才能解决疑难问题。这种情况，中学语文教学中遇到的比较多。比如，先秦的人吃的是什？穿的是什？怎么住、怎么行？怎么作战？他们的仪礼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进行文化交往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学语文中都有反映，而且常常成为学习的难点。即如现代文章，也有文化的难点。比如在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夏瑜为什么秋天被杀？为什么死后埋在西城墙根下？这些看起来很平常，但却牵涉到古代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文物制度、风俗人情。如不解决这些文化难点 学生也终不“解惑”。

再次，综合文化现象，贯通语文知识。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篇一篇具体作品中，但综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这样从整

体上去综合文化现象，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化的认识贯通语文知识。比如，《愚公移山》中有‘操蛇之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美女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白娘子’就可以综合出中国蛇文化走过了对“蛇”的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道路。又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隆中对》中的‘三顾茅庐’，《促织》中斗促织少年的‘三笑’等我们综合出中国古代人以三为极限的思维方法……抓住综合出来的文化体系加以深化阐述，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使他们将所学到的语文知识融会贯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一门在‘文化热’中兴起的新学科。它融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为一体，必将得到广大青少年的喜爱。这门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必将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更加完善。

第一章 地理文化

第一节 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 和发展中的作用

在认识地理文化之前，我们首先了解地理环境在一个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重要的观点。一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以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和德国的拉采尔为代表。他们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人口和种族的分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①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实际上已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20 世纪以来，该理论已不成为文化学界的主要理论，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批判。中国进入 80 年代，有人开始重新评价这一理论。另一种观点，以法国学者白吕纳为代表，认为“地理因素对于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影响并不发生同样严格和直接的制约”^②。

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承认地理环境，亦即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河流、山脉、矿产资源和动植物等，是一个传统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也往往是文化形成

《文化学辞典》，310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

同上，309 页。